

燕下都遗址考古新识

——赵国对燕下都的占据与改造

段宏振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保定易县县城东南，是迄今保存最好的东周都邑城址之一，其布局是研究周代城市结构及内涵的重要实证。考古学研究的最新证据表明，燕下都遗址的局部遗存例如东城隔墙，并非燕国修建或改建燕下都时的原本建筑，而是属于战国之末赵国占据时期的改造遗迹，因此有必要对燕下都遗址进行重新审视。

燕下都遗址东城隔墙质疑

燕下都由东西双城格局构成，其中东城北部近五分之一处又建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将东城分割为南北不对称的两个区域。这一布局一般被认为是燕下都城市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但隔墙的具体年代及确切性质并不十分明晰，因此需要认真梳理与考辨。

关于隔墙年代。隔墙解剖发掘的结果表明：隔墙地基叠压东城垣基础，隔墙的宽度仅为东垣的二分之一。这一结果说明隔墙与东垣存在着显著区别：始建时间不同，墙体建筑结构有异。但仅此依据还不足以说明隔墙的性质与功用，还需要准确把握其年代区间。

第一，隔墙年代的上限。东城中北部的武阳台宫殿夯土台基，是燕下都遗址体量最大的建筑基址，而隔墙紧贴武阳台基址的北侧。附近有一座战国晚期的44号墓葬，埋葬数十具战死的武士，并打破被毁的V号地下夯土建筑基址。据此，武阳台宫殿正常使用期的最晚时间，应在战国晚期晚段。而紧贴武阳台宫殿基址的隔墙，破坏了这座宫殿的主体功能，说明隔墙修建的时间不仅晚于武阳台宫殿，并且还很有可能是在此宫殿的主体功能废弃之后才建造的。这一时间节点同时也是隔墙使用期的上限，亦即隔墙的始建时间，即战国晚期晚段之始。

第二，隔墙的使用时期。隔墙的修建并未将武阳台宫殿完全废弃，隔墙东段有一座与墙体合为一体的7号夯土台基址，应属于隔墙的附属建筑，其性质大概以作守卫与瞭望之用。与隔墙紧密相连的武阳台建筑基址当与此非常相似，隔墙与武阳台本体建筑的北缘重合，武阳台原本的宫殿主体功能终止或根本性弱化，由原来的宫殿建筑转变为隔墙的附属防御建筑。如此，隔墙的存在时期与武阳台建筑转变功能后的使用期大致相同，因此隔墙的使用年代当在战国晚期晚段阶段。

第三，隔墙年代的下限。隔墙与东城北部的城垣配合使用，它们的年代下限应大体一致，亦即战国末期。

关于隔墙性质。长期以来，隔墙一直被视作是东城北部作隔断和维护作用的辅助墙体，因此成为燕下都布局的一个独特特点。但根据上述以44号墓、V号夯土建筑基址为代表的批批遗存证明，战国晚期晚段东城多处宫殿建筑废止，城区总体功能已经衰落。因此，隔墙的性质与功用便与东城城区原本的内

容无关，即并非出于原本规划的城区功能性的“隔断”之用，而是在东城原本功能衰落之后的一种城区改造，新建一道隔墙将城区北端围护起来而类似于一座“内城”或“小城”。这条隔墙就是新改造的“小城”南城垣。

综上，存在于战国晚期晚段的东城隔墙，是在燕下都城区主体功能衰落之后的改造建筑，并非燕下都修建或改建时的原本建筑。正因如此，这道隔墙在整个城区格局中显得有些突兀与异类，与城区诸多建筑元素之间存在着不够协调的缺陷。

赵国对燕下都的改造

燕下都东城隔墙，属于燕下都主体建筑衰落之后所改造的“小城”南墙。那么，这座战国末期的小城为何者所建，其性质及功用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晚期晚段，燕国误判长平之战后赵国势衰，欲趁机全力进攻赵国，未料遭到赵国强力反击，致使燕国接连失败，五年征战之后的结果是两国交换城池领土，燕下都为赵国所据。具体内容即：“（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其中的武阳，即燕下都。另据《赵世家》《燕世家》等记载，赵国占据燕下都长达二十余年，直至秦统一的前夕。

赵国占据燕下都的时间正是战国晚期晚段，与燕下都东城隔墙的年代基本相合。但要推定隔墙为赵国所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依据。综合梳理燕下都遗址的相关考古线索，可以归纳出4条证据。其一，武阳台主体宫殿周边宫殿基址群，于战国晚期晚段之前遭到战争焚毁，此为东城主体功能在战国晚期晚段衰落的实证。其二，44号武士墓葬，其中出土大量赵国货币等遗物，这是燕赵曾交战于燕下都东城之内的考古实证。其三，东城内发现有属于赵国的文化层堆积及遗迹遗物。其四，赵国铸造的“武阳”三孔布和“武阳司寇”铜玺，是武阳曾为赵国所属的文字实证。李学勤考证此布币与玺印均为赵国所铸，并推测赵有武阳约二十年。这是武阳曾一度归赵的直接文字证据。

以上4项考古实证，证明了赵国在战国晚期晚段曾占据武阳，并遗留有许多文化遗存，由此推定东城隔墙应为赵国进驻燕下都后所建。赵国建造此墙的目的应主要是出于守城与防御，武阳既是燕之旧都，又地近燕国南境，守城固土当为赵国的首要考虑。另外，燕下都经历剧烈战争，东城城区多有损毁。基于此，将燕下都转型为赵国新拓北疆之据点，应是赵国改造武阳旧城的主要出发点。于是在燕下都东城偏北部增建一道东西向城垣，将原有城区北端分割而改建为一座小型城堡。因此，所谓燕下都东城的“隔墙”，实乃赵国武阳新改造的“小城南墙”。



燕下都布局的重新认识

燕下都东城隔墙的年代及性质已然澄清，燕下都的城建历程无疑需要重新审视与认识，以恢复燕国所建武阳城的原本格局。排除隔墙之后，东城以横贯东西的3号河渠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北城区以宫殿建筑为主要内容，南城区的主要内容是手工作坊和普通居住区。但这只是燕国所辖东城最终所形成的城市宏观格局，其建设历程应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进与发展，城市时空格局变化的轨迹大致如下。

东周以前，大致以中易水北岸的东沈村遗址为核心，性质可能属于村镇或普通城镇，这是武阳为城邑之前的聚落基础。

春秋时期，东城南城区中南部一带为聚落集中区域，或已出现高等级建筑。此时的武阳至少属于大型城镇，或可能已具备城邑性质。

战国早期，东城已具备较完整的规模，中央纵向地带分布着大型宫殿建筑，集中的手工作坊区开始使用。本期晚段，九女台墓地开始使用，已发掘的16号大墓当属高等级贵族之墓，当是城邑规模与性质的一个极好佐证。此时武阳已为大型城邑当无疑，并且很有可能已为都邑的性质。

战国中期，现存东城的规模及建置应于此时完成，主体格局至此基本奠定成形，城市功能分区也渐趋明朗，以横贯东西的3号河渠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城区。此时的武阳城，城垣及河渠完备，城内功能分区明确，殿堂群集并存在核心宫殿，因此已具备完善的都邑之制。

战国晚期早段，西城大约始建于此时或稍早阶段，以作为东城的附郭之城。东城的布局继续得以完善，西北隅虚粮家墓地开始使用，东城中央轴线的宫殿群进入鼎盛时期，中南部一带的综合作坊区，以及南部的居民区持续繁荣。至此，武阳城最终完成了《水经注·易水》所言的“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的规模。这一阶段正是燕昭王时期，所谓“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之类的记载，固然可作昭王建城之说，但似更可作昭王时城池完全竣工之解。

战国晚期晚段，东城内武阳台核心宫殿的正常使用停止，附近一些宫阙区遭到焚毁或破坏。燕赵连年战争导致武阳城经历战火损毁，并最终为赵国所占据。赵国新建一道东西城墙，将东城偏北部收缩改造为一小型城堡。将赵国新改造小城的南墙视作原武阳东城内的“隔墙”，进而又将这道“隔墙”作为城市发展历程和功能分区的一个界标，实属一种误会和错误。（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跳出“辽西中心论”：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起源新视角

陈伟钧

熟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学者大多了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流行一种“中原中心论”，即认为新石器文化和文明最早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各个阶段都处于文化发展领先的位置；周边地区和中原地区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中原向周边传播的结果。到七八十年代，在周边地区考古新发现、陶器类型学断代方法完善和碳十四测年的推动下，学界发现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和文明起源在年代上与中原地区一样古老，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平等互动的关系；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某一特定阶段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中原地区。此后，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从“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说”。

在众多的“周边地区”或“多元”当中，辽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或一元。狭义的辽西一般指辽河和大小凌河流域。根据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有的学者往往把燕山以南的滦河流域乃至部分海河流域也与狭义的辽西划入一个文化地理单元进行研究，并也以“辽西”泛指这一范围。但是对于这种情形，更多学者使用“燕山南北地区”这一名词。为此，下文在提及辽西地区，只限于狭义。

史前辽西地区属于大的东北文化区是学界共识。在东北文化区的各个区域中，辽西地区是考古工作开展最为充分的地区。这种情形与20世纪50年代中原和周边地区考古工作开展多寡状况颇为类似。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相对于东北文化区其他区域，学界对辽西地区的历史文化时空框架及相关问题认识最为深入。因此，在对东北其他地区考古发现进行断代或讨论与辽西地区相似的文化因素来源时，学者不免以辽西地区为基准去衡量其他地区。

由已知认识未知，这当然是考古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一切以辽西为标准，“唯辽西是用”，很容易重蹈“中原中心论”的覆辙，从而陷入一种我们称之为“辽西中心论”的窠臼。具体来讲，中原地区在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但是如果把这种格局倒映为史前各个时期的情形，就陷入“中原中心论”。辽西地区兴隆洼、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是极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尤其是红山文化，甚至被认为已经进入文明时期。但是如果继续扩大，认为在整个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也起源于辽西；最早的玉器也出现在辽西，周边地区出现和兴隆洼文化相似的玉器，就被断定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辽西周边发现陶平底筒形罐，就认为是受兴隆洼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扩大化的思考方式，尽管研究者可能并非主观持有“辽西中心论”，但是在客观

上就陷入这样一种认识陷阱。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近十余年辽西以外的东北或邻近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化格局。这个格局提示我们，在将来对东北文化区史前文化研究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避免“辽西中心论”的倾向。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兴隆洼文化是辽西乃至东北及邻近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来兴隆洼文化前身——小河西文化也被识别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河西文化是燕山以北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其年代多被确定在距今9500-9000年，直接承接燕山以南的东胡林、南庄头、转年等距今12000-9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或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文化。这种视角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起源格局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

首先，2007年以来松嫩平原吉林省白城市双塔遗址（双塔一期遗存）发现了距今10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我们提出双塔一期遗存的主体年代更有可能是距今8700-8000年）。2011年以来，同为松嫩平原地区的吉林省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更是发现了距今13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后套木嘎一期遗存）。2013年以来，在小兴安岭南麓及三江平原一带，黑龙江伊春市桃山、桦南遗址和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一期），都发现了距今15000年前后的陶器，小南山遗址二期即小南山文化（距今9000-8600年）还发现成片的墓地以及成套的玉器（玉珠、玉管和玉璧）。

最近几年，燕山以西蒙冀交界地带岩类文化（距今约8700-7000多年）和四台文化（距今10000-9000年）等以小型村落形态出现的新石器文化也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的资料和研究，辽西地区小河西文化的年代还被推迟至距今7900-7700年前后。换言之之，在东北及邻近其他地区最早陶器和新石器文化被不断提早的同时，辽西地区最早新石器文化却被进一步推迟。

以上的新发现和研究显示，东北地区最早陶器的起源和最早出现的村落式新石器时代文化，都不在辽西地区。相反，尽管辽西地区在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乃至更晚的夏家店下层时期，是东北地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或陶器、定居和农业等文化要素起源的年代几乎是最晚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这种特点，值得进一步探索。更重要的是，这提醒我们，在研究东北史前文化格局，尤其是东北新石器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时，要跳出“辽西中心论”。

与上述发现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比如东北地区最早的玉器和蒙冀交接陶筒形罐等的起源，不少研

究者也多以辽西地区为标尺进行判断。

比如对于早年小南山出土的玉器，有学者将之与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玉器进行比较，判定小南山的玉器，部分年代与兴隆洼文化相当，部分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并认为是辽西地区影响的结果。从上述小南山文化的新发现来看，早年小南山遗址发现的玉器中，有部分玉器（如玉珠、玉斧等）与小南山文化新发现的玉器相似，不排除这部分玉器的年代早到小南山文化时期（距今9000-8600年），即远远早于兴隆洼文化。既然三江平原地区玉器的出现远远早于兴隆洼文化，这里出现的“兴隆洼文化相似”的玉器，一方面不能排除是自身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早于兴隆洼文化。实际上，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大多出现在兴隆洼文化晚期（约距今7500-7200年），其中的一些玉管就与小南山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因而不排除东北早期玉器的发展格局存在三江平原影响辽西的可能性。

对于蒙冀交接的裕民文化的平底筒形罐等文化因素，不少学者也是习惯性地认为受到兴隆洼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从目前裕民文化的陶器演变序列来看，尖圆底陶器向平底陶器的转变大约在距今8000-7600年（如康保县兴隆二期），这个年代略早于最新确定的小河西文化开始年代，更不用提兴隆洼文化了。而且裕民文化的陶平底器是一种小平底，更像是尖圆底自然演变的结果，和小河西-兴隆洼文化的大平底筒形罐有异。此外，从蒙冀交界地区的四台文化和裕民文化相关发现来看，这里的半地穴房于、磨盘磨棒、石块/石板灶乃至粟黍遗存似乎都早于小河西-兴隆洼文化，这两个地区的互动和文化传播方向甚至也不排除蒙冀交界影响辽西。

综上所述，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并非单一的独立起源和单方向的对外影响，更像是集东北及邻近各地区新石器过渡和新石器早期文化发展之大成的结果。这种模式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时期文明起源态势十分相似。可见，我们不仅要有意识地跳出“中原中心论”，也要有意识地跳出“辽西中心论”。

推而广之，何止要跳出“辽西中心论”，我们要跳出各种形式的中心论，即跳出以一种单一框架或模式去衡量所有地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窠臼。任何历史规律都是有着时空限定的。对此，历史和考古研究者不可不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考古研究专题”一般委托项目“新石器文化起源的中西理论比较”21@WTK00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考古科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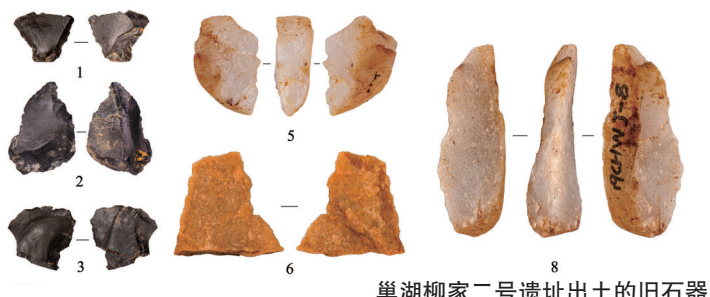
远古人类的江淮足迹

叶润清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从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到和县龙潭洞晚期直立人遗址，从东至华龙洞古老型智人到巢湖银山早期智人化石地点，远古人类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珍贵足迹；从滩溪石人找到蚌埠双墩，从含山凌家滩到潜山薛家岗，可以让我们穿过历史的时光隧道，去领略一万年文化史的淮河濠韵和古国文明时代的皖江图景；从肥西三官庙遗址到楚国最后的郢都寿春城……在为我们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或提供重要线索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代安徽多方面的重要成就和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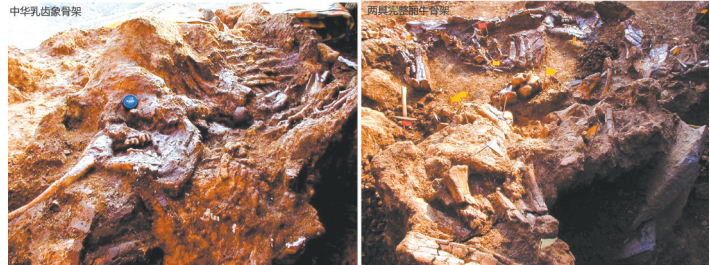
为了让社会公众能够通过考古发现系统了解古代安徽的历史文化脉络，本报拟陆续推出科普文章，以揭示安徽的悠久历史与厚重人文，展现安徽在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巢湖柳家二号遗址出土的旧石器



中华乳齿象骨雕



繁昌人字洞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人从哪里来？远古人类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现代人的？人类在起源和演化过程中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什么？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以下的考古发现也许能够启发你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

让我们首先把眼光投向长江岸边和县一个叫“龙潭洞”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和县陶店公社汪家山的一处洞穴中相继发现脊椎动物化石。洞穴下方的水潭被当地人称为“龙潭”，遗址因此得名。

1979-198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安徽文物工作队通过调查、试掘和两次正式发掘，在龙潭洞的洞穴堆积中发现包括1个完整头盖骨在内的共14件，代表3个以上个体的人类化石，最大测年数据距今约41.2万年，其他多为距今30多万年。发现者将其命名为“和县人”，是与“瓜哇人”“北京人”特征相近的晚期直立人。

这是我国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晚期直立人化石。

无独有偶，1981年底，在与和县“龙潭洞”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的巢县（今巢湖市）岱山公社岱山大队银山村采石场，安徽省地质局在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1982-198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安徽文物工作队先后两次对该地点进行发掘，获得代表2个个体的早期智人枕骨、上颌骨等化石5件，年代距今约20万-16万年。

这是我国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早期智人化石。

亚欧地区迄今最早的人类遗存

再看安徽长江南岸。

同样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繁昌县（现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的村民在一处名为癞痢山的山坡上采石时，也发现了动物化石。

1998年初，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研究正式启动，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占祥院士认为，皖南长江下游是我国寻找早期人类化石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安徽课题组应运而生。

其后，课题组先后10次对癞痢山地点进行发掘，发现早期人类加工、使用过的石制品100多件，骨制品几十件，以及包括高等灵长类原黄狒在内的近80种哺乳动物化石8000多件。

主持前期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金昌柱研究员根据形状，将发现人工制品和动物化石的洞穴命名为“人字洞”。经生物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综合研究，“人字洞”遗址地质年代为更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56万-220万年，是亚欧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

古老型智人化石与旧石器地点群

在安徽长江南岸发现的另一处古人类遗址是东至县华龙洞遗址。

2004年的一天，东至县村民卢成金木在梅源山上修整羊圈时，竟偶然发现了一块“龙骨”。同年5月，安徽省博物馆在沿江地区开展第四纪古生物调查时，也曾在附近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2006-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5次对该地点进行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20余件，其中包括1具保存有眼眶和部分面部的完整头骨。同时还发现大量人工切割、砍砸痕迹的骨片，旧石器和20余种脊椎动物化石。

2006年第一次发掘结束后，发掘者根据堆积特征与动物群组成，推测该遗址与现代人起源有关，将其命名为“华龙洞”，寓意“中华始祖、龙的传人”，是晚期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形态。

与此同时，围绕和县晚期直立人和银山早期智人研究开展的巢湖地区专项考古调查工作也从未间断。

2019年，巢湖市柳家自然村附近的两处旧石器地点在调查同时发现，被分别命名为柳家遗址和柳家二号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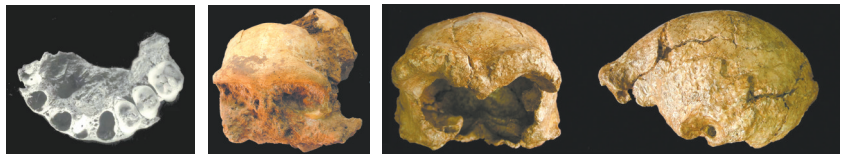
2020-2021年，柳家二号遗址经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2100多件，主体年代距今约7.8万-3万年，是安徽迄今发现石制品数量最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此外，在宣城的水阳江流域，考古调查、发掘共发现宣州向阳陈山、孙埠麻村，宁国毛竹山等旧石器地点20多处，出土大量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总体年代距今约90万-15万年。

从繁昌“人字洞”亚欧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制品，到和县“龙潭洞”晚期直立人化石，从宣城水阳江流域旧石器地点群到东至“华龙洞”古老型智人化石，从巢湖银山早期智人化石到柳家二号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古人类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一处处珍贵足迹。

由此而获得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安徽长江流域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而且与长江中上游和我国其他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发现互为补充和印证，形成了人类起源与演化在我国境内的完整证据链，为“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和“东亚直立人到现代人连续进化说”提供了科学实证，凸显了安徽在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安徽还会有更多的远古人类遗存被发现。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从左到右：巢湖银山发现的早期智人上颌骨化石、东至华龙洞遗址出土的古老型智人头骨化石、和县猿人头盖骨化石